

# 词典话语与社会互动:《新英汉词典》例证的历时对比分析\*

陈文革<sup>1</sup>, 吴建平<sup>2</sup>

(1. 2.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1. 厦门理工学院 外语系,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 文章将词典话语视为语境重构的过程, 以 Fairclough 的话语与社会互动观以及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观为分析视角, 对《新英汉词典》不同版本的例证进行历时对比分析, 揭示了语言使用和社会共变的事实, 反映了词典话语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关系, 由此得出结论: 将词典作为话语并置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有助于拓展并完善词典批评体系。

**关键词:** 词典话语; 《新英汉词典》; 例证; 历时对比

**中图分类号:** H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43(2012)02-0029-07

## 1.0 引言

词典在公众生活中享有几乎无可置疑的权威。它被奉为学习者的“无声的老师”, 人们经常查阅词典以获取信息。研究者甚至法庭也经常“引经据典”以强调某个词语或某个概念是如何使用的, 或者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而, 从批判的角度上看, 词典, 作为社会关系影响下的产物, 往往会有来自编纂者个人以及其所代表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的主观意识的渗入。“社会的思想意识通过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 特别是通过词目的选择、语词的定义以及例证的选择显现出来, 这样, 词典反过来可以作为了解社会价值观念的途径。”(Algeo, 1990: 2006) 迄今, 将词典作为话语, 从批评性语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的词典话语分析在国内外辞书研究中并不多见。词典话语分析的任务和目标是通过分析词典的内容揭示潜藏于词典内部的理念, 它与传统词典学理论(metalexigraphy)下的词典批评(dictionary criticism)存在一些区别。传统的词典批评视词典为“工具”, 因而大多是技术层面上一些评价性、纠错性或抨击性的评论。毫无疑问, 这些词典批评对促进词典编纂的健康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 词典批评不应只停留在“词典工具论”层面上, 应将词典视为一种话语并把它放到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分析研究, 这样有利于促进词典批评理论

体系的完善。“我们必须在语境中阐释词典, 将词典视作既是语境的顾问亦是语境的组成部分。就像我们对待其他文化产物一样, 我们承认文化产物是语境的反映, 但也是构成语境的成分。这些语境我们必须尽量通过尽可能多的其他文化产物和文化行为加以了解。”(Fishman, 1995: 34) 这样才能更公正客观地看待词典的生产和消费。对于词典话语的批评性分析, 目前国外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词典文本中的性别和种族主义现象, 如 Lehmann & Beaujot(转引自 Bejoint, 2002: 134) 发现 1971 年前的法语词典中, 关于“女性”的定义总是与家庭有关, 从未将“男性”与家庭联系起来。Hoey(2001) 分析了 COBUILD 词典对 man 和 woman 的定义之后, 发现了词典的释义明显偏袒男性。Bejoint(2002) 在其 *Modern Lexicography: An Introduction* 一书中还列举了许多类似的研究, 并以此来说明词典要做到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 词典必然反映了社会的某种理念偏见。Hornscheidt(2008) 较早提出在批评话语研究的框架下进行批评词典研究, 并通过分析德语、丹麦语、瑞典语单语词典中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现象, 证明词典参与建构社会现实。可以看出, 以上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单语词典的释义, 且多数是共时性的或者针对的是单语词典。针对双语词典例证的批评语篇研究很少见, 国内从该角度研究词典的尝试更是屈

收稿时间: 2011-11-09

作者简介: 陈文革(1972-), 男, 福建南安人,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生, 厦门理工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话语分析、双语词典研究与文化语义学。

吴建平(1956-), 男, 福建厦门人,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文化语义学研究、双语词典与翻译研究。

指可数。《新英汉词典》出版 30 余年,先后推出过第 1 版(1975,以下简称 75 年版)、增补本(1985)、世纪版(吴莹,2000,以下简称世纪版)及最新的第 4 版(高永伟,2009),共计 4 个版本。国内学者曾围绕该词典不同版本的例证等进行过批评比较研究,但大多针对增补本与世纪版的不同(如丁志聪,2003;陈丛梅,2002),较少涉及 75 年版。这些对比分析虽是历时性的,但所做的“厚此薄彼”的评论仍主要是传统的词典批评,仍未跳出技术性评论的圈子。鉴于此,本文将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视角出发,把词典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和认知实践话语,通过考察分析《新英汉词典》两版本例证中一些文化关键词的增减以及同一词汇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语义倾向,揭示话语-认知-社会三角关系是如何运作的。

## 2.0 词典话语、社会认知与批评性语篇分析

在批评性语篇研究中, Fairclough (1992) 把任何“话语事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文本生产和消费)的例子和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话语与社会之间互为建构。van Dijk (1993) 认为微观话语与宏观社会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话语与社会的互为建构关系是以社会认知为中介才得以确立的。不论是话语反映社会、还是话语参与塑造社会现实都是通过人的认知来实现的。它们呈现为一种话语-认知-社会的三角关系。就词典而言,词典话语本身负载了特定的社会理念和权势关系,反映了词典编纂者对当时社会的认知和理解,它们都以心智模型的形式存在于编纂者的脑中,并最终决定了词典话语行为的形式和内容。即宏观社会通过影响词典编纂者的社会认知,从而影响了词典话语行为的内容。反之亦然,词典编纂者通过词典话语实践影响大众的社会认知,进而影响了大众的社会行为,这些大众行为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词典话语与社会的互动是以社会认知为中介才得以确立的。话语-认知-社会三角关系得以运作的手段是语言手段和话语策略。如此,只有对微观语言使用的分析才能揭开其中的理念建构和权力关系。通过引入人的因素特别是认知因素, van Dijk 不仅阐明了微观话语和宏观社会之间如何形成互动,也为通过话语分析揭示内在关系找到了依据。

Frawley (1989) 曾把 Beaugrande 和 Dressler 关于语篇特征的七条标准应用到词典上,提出了词典语篇论。之后,多位学者对 Frawley 的词典语篇论进一步

拓展,提出各种词典的语篇特征,如范敏、孙迎春(2008)等。Hoey (2001) 更是将词典和报纸称为蚁群语篇(colony text)。这类语篇中相邻成份并没有形成连续的文章,但它们仍然构成明显的宏观语义关系。

可以将具有相对固定结构的词典看作是大语篇(super text),而词典内部各个功能组成部分包括前言以及释义、例证等都是这个大语篇下面的亚语篇(subtext)。词典中每个词条可视作一个个独立语篇(篇章或文本)。按照 Hoey (2001) 的观点,这些亚语篇之间构成宏观的语义关系。是语篇,它必然是互文语篇。双语词典例证的互文来源包括单语词典,编者自撰例,或实际语言材料(包括语料库)。社会对词典编纂者的认知产生影响,这些认知在编纂者的脑中构成心智模型,并指导其话语策划,即词典的形式和内容,如具体的例证选择。“词典编者所挑选用来解释意义的例证尤其能说明文化期望”。(Miller & Swift, 1976: 64) 因此,通过分析双语词典例证的重构特点可以揭示社会文化语境。

词典的例证被视为是词典的“灵魂”。“例证不仅补充说明词的意义,使其具体化,而且说明它的语法特点、搭配范围、修辞色彩。例证可以揭示词的实质,说明它的内涵与外延”。(黄建华、陈楚祥,2003: 60) 相对于词目词的收入选择以及词的释义,“例证语义内容的选择相对自由,因为例证主要是用来解释句法行为或提供额外语义信息”。(Bejoint, 2002: 135) 这种相对的自由给了编纂者或者其上层机构传递主流社会价值、捍卫社会道德的便利,因而也是词典及其上层机构构建理念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双语词典的例证是个语境重构的过程,必然会融入编者的主体间性。

我们不赞成将(双语)词典视为一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过程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双语词典编纂本质上也是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即将原语语境中某个因素(如词汇)转移至新的目的语语境中。按照 Linell (1998) 的观点,语境重构指的是某话语要素从一语境中的话语/文本向另一语境中的话语/文本的动态转移或转变过程。语境重构出现在话语的各个层面,包括篇内互文(intratextual)、篇际互文(intertextual)以及语类互文(interdiscursive)。语境重构源自于 Bernstein 教育社会学,他认为“教育话语是按照一种语境重构的原

则,有选择地对其他话语进行征用、重置、重新聚集并与之产生联系,进而构建自己的话语秩序的”。(Bernstein, 1996: 47) 词典话语秩序的构建与教育话语一样,也征用其他话语,也与前话语产生互文以利于自己的生产和消费。在编译双语词典的过程中,就释义而言,编纂者往往根据原语词典所给的语义,考虑原语描述的对象,然后在脑海里搜集这个词在目的语语境中的表达方法,并从中进行恰当的选择。

### 3.0 《新英汉词典》例证的具体分析

#### 3.1 语料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选用的语料是 1975 年版和 2000 年版《新英汉词典》中 S 字母部分所有的词目词,以及 100 个常用动词<sup>①</sup> 条目里的所有例证,包括短语例证和句子例证,并各自建立语料库。其中,75 年版的语料库共收集了 848 个词条里的 8573 个例证(共 49,920 词);世纪版的语料库共收集了 575 个词条里的 5577 个例证(共 34,450 词)<sup>②</sup>。1966 年-1976 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新英汉词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编写并出版的,正如,75 版的“前言”提到的,“《新英汉词典》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编写、出版的”。而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其社会背景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贸活动全球化,社会民主化不断深入。因此,对反映两个不同时期的语料进行对比分析应能揭示这种变化。

因为本文收集的语料为特殊的蚁群文本,即词目词下的例证,这些文本本身的主题性并不像其他文本一样高,所以使用观察语料库与参照语料库提取主题词的方法较难充分体现本文两个语料库的区别。因此本文借鉴了 Baker(2008)的另一种提取关键词、计算关键性(keyness)的方法,即在两组同话题子语料库中,相对于另一语料库,一个语料库出现了

哪些频率异常高或低的词。

Landau(1985)曾针对同一部词典相隔 15 年的两个版本,考察例证中有关儿童-大人关系,家庭成员,性别以及男女关系的指称在新版中删除、保留或增加等变化情况,说明了词典反映了变化中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 Landau 和 Baker 的启发,我们采取一种变通方法,即通过 Wordsmith 3 分别提取列出 75 年版和世纪版例证语料的词表(wordlist),然后利用 Wordsmith 3 的关键词功能,将 P 值设为  $\leq 0.05$ ,对比两个词表,考察 75 年版例证语料中的哪些词汇在世纪版已完全消失,哪些词汇的出现频率异常高,世纪版又增加了哪些 75 年版中未出现的词汇。通过分析这些消失、增加或出现频率较为异常的词汇,揭示两个语料库所反映的主题倾向差异。统计列表重点考察非检索词目词表中的词。尽量排除了词目词以及一些功能虚词,如介词、副词等,一些万能动词(如 make, get, turn)以及其他一些不具有特定社会含义的词汇(如 teeth, least)。这样我们共提取了三列词语:75 版语料中出现但在世纪版已经消失的词汇(表一);相对于 75 年版,世纪版新出现的词汇(表二);75 年版、世纪版语料中均出现,但其语义韵或主流意义已发生明显变化的词汇(表三)。分析过程采用 Fairclough(1989: 26)提出的话语分析三步骤:描述、阐释和解释。

#### 3.2 75 年版、世纪版例证的互文对比分析

词语是社会的产物。词语存在了一段时间逐步消失或淡出,是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缘故。语词所使用的意义最能体现它对现实的反映。(陈光磊, 2008: 25) 尤泽顺(2009)则认为,在语言使用中,词汇选择既帮助使用者表达思想,也帮助他们构筑话语理念。因此,对比分析《新英汉词典》75 年版与世纪版例证中的词汇可以揭示中国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话语构建方式以及社会现实。

表 1 75 年版出现但世纪版已消失的词汇(词后数字为其出现频数)

revolutionary 50	comrade(s) 29	imperialism 20	imperialist(s) 12	Peking 17
capitalist(s) 19	capitalism 4	peasant(s) 31	masses 18	proletarian 9
proletariat 9	reactionary 9	reactionaries 5	socialism 8	socialist 12
communist 7	communism 7	Li 8	Wang 8	bourgeois 8
Mao 11	Chairman 9	revisionists 10	liberation 10	PLA 9
commune 12	Marxism(t) 8	Lennism 6	ideology(ical) 8	cadre(s) 7
landlord 5	aggressors 5	exploitation 4	militia(men) 4	militant 4
Yenan 4	countries 8	trade 6	forces 6	collective 5
tiger 4	tradition 4	returns 4	position 4	

表2 相对于75年版,世纪版例证新增的词汇

Beijing 7	sore 4	computer 5	wake 5	sponge 5	spirits 4	Tom 4	childhood 4
wedding 3	park 3	fortune 3	expression 3	exercise 3	birthday 3	scholar 3	

表3 75年版与世纪版出现频数相差较大或主要词义或搭配差异明显的词汇

75年版	revolution 33	enemy(ies) 103	worker(s) 27	people 77	class 30
世纪版	revolution 1	enemy 10	worker(s) 3	people 26	class 4
75年版	struggle 35	P(p)arty 21	red 30	world 36	criticism 18
世纪版	struggle 10	P(p)arty 5	red 9	world 8	criticism 1

在关键词表中, P 值为 0.000000 的共有 6 个词语: enemy, revolutionary, turn, set, revolution, run, 其中 3 个(turn, set, run) 既是检索词目词, 又是英语词汇中常用动词。另外 3 个词不仅出现频率异常高, 且它们的文本分布值(dispersion value) 也非常高, 因此 enemy(敌人) 和 revolution(ary)(革命) 作为文化关键词可以反映 75 年版语料库的主题倾向, 即“敌人”和“革命”反映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社会现实: 中国在与敌人作斗争, 中国正进行革命。那与什么人进行斗争? 革命的内容是什么呢? 从表 1, 可以看出, 以 ist 或 ism 结尾、表征阶级斗争的词汇(如 imperialism, capitalist, socialism, communism 等) 较为凸显。根据社会身份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Shaffer, 2004), 一些社会行为(者) 在现实中扮演着比较显眼的角色, 因此他们的凸显也会通过语言进行编码并在文本中得到强调。我们把表 2 中这些在世纪版语料中消失的主要词汇排列起来并添加些词语, 就可以得到以下内容: 国内、国际的革命(revolution) 进行得如火如荼, 广大工农兵(workers \ peasants \ PLA)、革命群众(masses) 在共产(communist) 党(Party) 的领导下, 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Marxism-Leninism-Mao Tsetung Thought) 的指引下, 正在进行社会主义(socialist)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正与包括帝国主义(imperialism)、资产阶级(imperialist)、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 等敌人(enemy) 进行艰苦斗争(struggle)。

而世纪版词典中相关词汇的删除, 反映了处于 21 世纪初的中国, 阶级和政治斗争已不是主流文化。表 2 所列举的世纪版新增词汇更趋向中性色彩, 如 computers, park, wedding, birthday。这些新增词汇一方面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的变化, 也说明了国内国外环境较为平和, 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旋律, 社会关系趋向和谐。

对表 3 中的词汇, 我们考察了它们在两个对比语料库中的汉语译语以及它们在文本中的搭配情

况, 借此分析这些词汇的语义倾向(semantic preference), 以及这些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主流意义, 探寻这些词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revolution”一词在 75 年版词典中更多的是指向当时的中国革命, 常与 Chinese, socialist, proletarian, sacred 等词汇搭配连用, 在被赋予积极语义韵的同时, 也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 如“join the revolution”, “shed one’s blood for the revolution”, “sow the seeds of revolution”, “the Great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世纪版词典只在“sun”词条下, 保留了“The earth’s revolution about the sun”, 去除了 75 年版中那些政治色彩的例证。有关“enemy”的例证, 世纪版词典去除了与“enemy”搭配连用的“class”(阶级)等词, 以及众多充满“destructive”(毁灭性)的词汇, 如“Annihilate three enemy battalions at one stroke”, “The heavy blow sent the enemy spinning to the ground.”, “Dig out a class enemy as one would a time bomb.”。世纪版中含有“enemy”的例证数急剧减少(只有 75 年版的 1/10), 且战争“火药味”已减少。同样地, “struggle”在 75 年版文本中大多与“revolutionary”或“class”搭配, 指涉那个年代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 而在世纪版中, 这些指涉革命或阶级斗争的例证已消失, 更多的是与“difficulties”, “snowstorm”或“cancer”等生活或自然界现象作斗争。“red”在 75 年版例证中多与“Red army”(红军)或“Red flag”(红旗)等具有更多政治色彩的词汇搭配, 而在世纪版中则就多与“red flower”(红花)或“red wine”(红酒)等无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词语搭配。词汇语义倾向的变化说明了社会演变, 并通过文本体现出来。

另外一些词(主要是多义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主要意思或汉语译语的差别上。共时性一词多义(polysemy) 研究考察的是具体意义的相对价值以及中心(基本)义与从属义之间的关系。多义词的多个意义中, 总有一个是某个时期最常用最主要的, 这个

意义叫“基本义”。基本义是就某个时代中多义词在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和使用频率而言的。(胡明杨, 2000: 213)也就是说,“基本义”是与社会文化语境紧密关联的。在特定的历史或社会语境中,这个基本义在我们的认知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每当我们碰到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意义。因此,基本义可以用来反映社会的变迁。表3有关75年版与世纪版语料中主流词义差异明显的词汇,反映了中国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如,“party”在75年版中均为大写,指“(共产党)”,而在新版的5个例证中只有一处大写,特指“(共产党)”,3个指称“晚会”。新增了一例反映西方文化的例证“The party won 249 seats, a loss of sixteen from its pre-election strength.”这说明“(共产党)”,作为社会行为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扮演着比较显眼的角色,文本中高频出现这些文化关键词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火热的社会生态。

一般来讲,词语都与某一范畴相联系。但根据Cruse(2000)的动态意义建构论,词语既不与具体词义,也不与具体的概念范畴相联系,范畴的建构取决于语境。即某个词语到底属于哪一类范畴,要根据语境来确定。按Williams(1983: 52)的划分, class 的意义可分为两类: 1) class 作为一个指涉任何群体的普遍语词; 2) class 作为一种描述社会组织的特别语词。没有具体的语境,难以判断该词的范畴归属;反之,通过该词的使用语境,我们可以将该词范畴化。“class”在75年版语料中出现30次,其中26次均取“阶级”之意,与 enemy 或 struggle 等词搭配,如“Hatred against the class enemy surged within him.”或“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而世纪版则只去除了所有含有“阶级”的例证,保留了其中4个译为“等级”、“班级”的例证,如“section a class for oral drills”。“workers”在75年版中出现20次,但每次的汉语翻译均是“工人”,而在世纪版例证中的汉语对应词则是“职工”。同样地,“people”在75年版中大多译为偏政治色彩的“人民”,在新版中则为“人们”。也就是说, class、workers 和 people 在75年版语料大多属于政治或意识形态范畴的特别语词,而在世纪版中则大多属于中性的、意识形态不明显的普遍语词。

通过对75年版和世纪版例证的历时对比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体身份和现象的表征方式已从强调阶级划分向强调社会功能转变。世纪版有意地消

除了75年版中一些有“政治色彩”的例证,淡化词汇的政治和革命色彩,尽量去实现“为词典而编词典”(dictionary for dictionary's sake)的宗旨。不管是消失或新增的词汇,还是相关词汇的语义韵和主流意义的变化,都说明了两版词典不同的语境重构原则: 75年版《新英汉词典》的编纂理念更多的是突出词典的政治功能,将词典或外语视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世纪版更多的是强化词典的教育和社会功能,淡化词典的政治宣传功能。这与两个时代的中国社会语境是分不开的。黄莹(2007)曾将1949年-2006年的中国社会分成三个阶段(1949-1966, 1967-1978和1979-2006)并统计了此三个阶段《人民日报》社论的关键词,其中1967-1978的高频关键词为“革命、毛主席、人民、路线、群众、社会主义和斗争”;而1979-2006期间则为“建设、发展、改革、人民、改革”等,以此说明社会语境变化与重新语境化的关系。对比发现,75年版《新英汉词典》的关键词与1967-1978的社论关键词几乎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政治话语体裁在向词典等教育话语侵蚀;也说明了词典话语,与其他政治话语如《人民日报》一样是与社会互动的,75年版的“前言”也印证了这种关系:“随着国内、国际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学习……迫切希望掌握外国语这一斗争武器,更好地为我国三大革命运动、为国际反帝反修斗争和增进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事业服务。《新英汉词典》的编写,就是试图为学习者和使用英语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内容较新又比较切合实际的工具书。”(新英汉词典编写组,1975: 前言)而世纪版没有出现1979-2006阶段的文化关键词,代之以反映科学技术词汇,则说明了21世纪的中国话语已出现了Fairclough(1992)所说的话语民主化,说明了此时的中国社会环境较以前宽松、和谐。

词典使用者并不一定要求客观性。他们希望词典能反映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Bejoint, 2002)《新英汉词典》要生存,必然也要“与时俱进”。词典的“与时俱进”说明了词典话语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但是,这种互动是通过社会认知这个中介来实现的。以75年版词典为例,70年代的中国,政治革命斗争是主线,当各种各样描写报道革命斗争的话语不断被人们耳闻目睹时,这些话语便帮助建立和具体化(instantiate)人们对理解革命斗争的认知框架,成了社会共享知识的潜在资源。当人们最终接受这些话

语为“真理”,并开始相信到处在进行“革命斗争”时,这种构建便成了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反过来又成了人们理解、阐释社会事件(即社会现实)的框架。class 等多义词的主流意义变化便是人们认知变化的结果。有时客观事物根本没变,但人的认知方式或框架发生变化,结果是呈现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总之,认知决定了话语的谋划和解释以及语境重构原则。

#### 4.0 结论

本文对《新英汉词典》不同版本的例证进行了历时对比分析,揭示了语言使用和社会共变的事实,反映了词典话语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将词典作为话语并置于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有助于拓展并完善词典批评体系。传统的词典批评过多地强调了词典的工具性,忽视了词典话语与其他话语一样都是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因此,要注意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评价过去的作品,而应将之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下加以考量,这样的词典批评才会客观公正。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尤泽顺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 注释:

① 由 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 统计出来的英语动词词频表中前 100 个动词,见 <http://ucel.lancs.ac.uk/bncfreq/lists/5-2-all-rank-verb.txt>。

② 由于世纪版大幅减少了例证的数量,转而以增加词汇为主,许多词目词下没有提供例证或给出的例证很少,因此本文所收集到该版本 S 字母词目词下的例证数远少于 75 年版中的例证数。

#### 参考文献

[1] Algeo, J. American lexicography[A]. In Hausmann, F. J. et al. (eds.). *Dictionaries: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exicography* [C]. Berlin: De Gruyter, 1990, (3): 2006- 2007.

[2] Baker, P. *Using Corpora in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Continuum, 2008.

[3] Bejoint, H. *Modern Lexicography: An Introduc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4] Bernstein, B.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 [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6.

[5] Cruse, A. *Meaning in Languag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1989.

[7]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8] Fishman, J. A. Dictionaries as culturally constructed and as culture-constructing artifacts: The reciprocity view as seen from Yiddish sources[A]. In Kachru, B. B. & H. Kahane (eds.). *Cultures, Ideologies, and the Dictionary: Studies in Honor of Ladislav Zgusta* [C]. Tübingen: Niemeyer, 1995. 32- 38.

[9] Frawley, W. The dictionary as tex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989, 2(3): 231- 248.

[10] Hoey, M. A clause-relational analysis of selected dictionary entries: Contrast and compatibility in the definitions of ‘man’ and ‘woman’ [A]. In Caldas-Coulthard, C. R.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s: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 London: Routledge, 2001.

[11] Hornscheidt, A. A concrete research agenda for critical lexicographic research with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racism/colonialism in monolingual Danish, German, and Swedish dictionaries[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08, 5(2): 107- 132.

[12] Landau, S. The expression of changing social values in dictionaries[J]. *Dictionaries*, 1985, (7): 261- 269.

[13] Linell, P. Discourse across boundaries: On recontextualizations and the blending of voices in professional discourse[J]. *Text*, 1998, 18: 143- 157.

[14] Miller, C. & K. Swift. *Words and Women* [M]. London: Anchor Press, 1976.

[15] Shaffer, D. W. Us, ourselves, and we: Thoughts about social( self) categorization [J].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SIGGROUP Bulletin*, 2004, 24(3): 19- 24.

[16]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society [A]. In Crowley, D. & D. Mitchell(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C]. Oxford: Pergamon

- Press, 1993.
- [17] Williams, R.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8] 陈光磊. 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9] 陈丛梅. 评《新英汉词典》世纪版的例证[J]. 辞书研究, 2002, (4): 11- 16.
- [20] 丁志聪. 浅评世纪版《新英汉词典》[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3, (1): 26- 29.
- [21] 范敏, 孙迎春. 语篇视角下的译学词典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08, (2): 34- 39.
- [22] 高永伟. 新英汉词典(第4版)[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23] 胡明杨. 语言学概论[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 [24] 黄建华, 陈楚祥. 双语词典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5] 黄莹. 对表征中国社会的话语的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历时分析[D].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7.
- [26] 吴莹. 新英汉词典(世纪版)[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27] 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新英汉词典[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28] 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新英汉词典(增补本)[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29] 尤泽顺. 话语秩序与对外政策构建: 《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变化分析[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9, (2): 44- 48.

### Interaction Between Lexicographic Discourse and Society:

####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Illustrative Examples in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Chen Wen-ge<sup>1</sup>, Wu Jian-ping<sup>2</sup>

(1.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China)

**Abstracts:** Regarding lexicographic discourse as a re-contextualizing practice, and integrating Fairclough's interactive view toward discourse and society and van Dijk's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his paper makes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illustrative examples in two editions of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t reveals language use co-varies with society and that dictionaries and society mutually construct each oth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seeing dictionaries as discourse and studying th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elp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dictionary criticism theory.

**Key words:** lexicographic discourse;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llustrative examples; diachronic comparison